

黄光耀《白河》中的民间记忆书写

三峡大学 晏雪峰

在长篇小说《白河》中,作者黄光耀围绕一处处地名书写关于白河的记忆,从冷水溪、芦花洲到仙人洞,承载着民间记忆的白河既串联起田家的家族记忆,也呈现出通往历史深处的民间脉络。黄光耀以民间记忆为窗口,展现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家庭与个人命运。白河作为民间记忆的生成场域,既保有原生民间社会的复杂特质,也随着历史洪流不断向前发展。白河与底层大众联系紧密,是孕育民间记忆的典型场域,而民间记忆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非主流性与难以被言说的特质,使其始终面临被历史筛选和修改的处境,也恰好反映出正统历史对这类记忆的遮蔽与忽略。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言:“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白河作为民间记忆的生成场域正是这三者的统一,所突显出的是以田家作为典型代表的白河沿岸村民的集体记忆,他们的记忆从先辈定居于此便开始了记忆与场所的联结,因而白河对于沿岸居民而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记忆原点。书中田岩宝关于河流的哲思、田荷花的婚恋启蒙以及田大年搬家,这些都与河流产生着

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关联正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结果。白河最初的作用是为当地民众提供生存的民间物质场所,其次是繁衍的场所,最后是精神原乡的慰藉,在此意义上白河形成了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的统一。也正因如此,在田岩宝的世界里,白河如母乳一般孕育了他的生命,这份滋养既来自物质层面,也完成了对河流认知的意识塑造。在白河沿岸居民的观念中,河流是神圣且值得感恩的存在,这是被河流养育所催生的情感,也是人与土地互动形成的自然崇拜。文中写到先辈们将身体器官的名称投射到白河各处,为流域内的地点赋予称呼,这些名称的传承与背后的意蕴,恰恰投射出底层民众最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对人与土地关系的思考。因此,白河既是典型的民间形态空间,也是民间记忆的生成场域。

陈思和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时提出,“民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与方向,它是

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渠道,同时具备形态多元性与藏污纳垢的特点。事实上,这一沟通渠道的形成恰好源于民间本身的特质:民间的多元性与藏污纳垢性,意味着其承载的记忆需要接受合法性审判,而这种局面的背后,是权力话语对合法性的维护与争夺。离经叛道的田大年典型的民间人物代表,担任大队支书的何诗光则是政治权力的代表,在二人的博弈中,田大年的身份与命运被无情改写。同理,彭梯玛也在时代洪流中,被个人仇恨与政治权力无情审判。以田大年 and 彭梯玛为代表的个体记忆无法进入正统历史叙事,甚至会被历史和集体遮蔽、修改,这正是合法性争夺的结果。民间存在于社会体系之中,它的特质并不代表民间记忆拥有独立性,反而说明民间记忆始终难逃权力的筛选与篡改。历史化与经典化是构建国家记忆传统的两个核心面向,在记忆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维度,二者体现的正是对记忆的普遍性总结与特

殊性修改。所谓普遍性,就是从民间记忆中提取可用于历史记忆与经典记忆书写的内容,让民间成为记忆的生成场域与被选择对象;而所谓特殊性,就是剔除民间承载的私人记忆细节与内容,完成对记忆书写合法性的争夺。

黄光耀依托白河这一流动的物质载体从民间的视角呈现地方与历史,通过湘西地方的家族记忆和生命体验建构起民间与历史的互动细节。田家的兴衰变化表面上是个体记忆和家庭记忆的交流互动,背后更是历史对于个体和家庭的形塑。黄光耀的民间记忆书写反映出的是民间记忆的不合法性与被动性,白河串联起村民对于地方的整体感知和记忆,然而这种感知和记忆的合法性却始终未被政治人物、文化知识分子等权力阶层言说和认同,被动性就此而产生。白河是湘西土家族人生活和感知生命之河,呈现出土家朴野记忆中的至真、至善、至美。作为记忆之场的白河,在记忆与历史的互动中,终究是流动的、碎片化的家族记忆,无法被纳入系统的历史书写之中,折射出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无奈,最终也只能随着时间而消逝。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重庆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西部先进制造业高地,面临着产业结构偏重、交通运输碳排放集中、能源结构偏煤的现实压力。2024年5月至6月,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重庆市开展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已成为当地一项重要任务。“如何强化审计监督效能,通过政策跟踪审计精准识别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中的堵点,助推相关政策落地落实”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重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中的典型堵点

(一)能源转型与生态碳汇培育政策落地存在长效短板。从“十四五”收官结果看,《重庆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2025年量化指标呈现分化,工业节能、节水等四类指标超额完成,能源转型、生态碳汇两大领域约束目标未能达标。方案设定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25%、森林覆盖率57%、森林蓄积量2.8亿立方米,实际分别仅达23%、55.07%、2.65亿立方米。原因在于现有政策体系偏向短期工业末端治理,而对长期能源结构调整与生态碳汇培育的战略投入不足,能源转型激励、林业碳汇价值转化配套制度供给不足。

(二)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流域大气联动管控存在明显短板。在流域层面,川渝虽设立了全国首个跨省市联合河长办,也建立起联合巡查、联席会商等9项工作机制,但跨界河流

强化审计监督效能 助推重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重庆财经学院会计学院 陈元媛

“联而不动”的问题依然存在。例如,万达开(万州、达州、开州)地区的跨区域规划缺乏协调性,上下游、左右岸的治理管控意见不统一,存在跨界排污情况,联防联控的长效机制仍不稳固。在大气联防联控层面,川渝虽已协同部署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但重庆市政协委员明确指出,当前仍存在“跨区域协同治理不够深入”、协同减排与污染防控不到位等问题。

(三)企业转型内生动力不足,动态管控缺位。重庆高能耗企业绿色转型成本高,节能改造、煤炭清洁替代、超低排放改造等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多数企业仅达到环保底线标准,主动推进减污降碳的意愿偏弱。例如,长寿区仅5家企业参与出售盈余碳配额,市场活跃度欠佳。在动态监管层面,缺乏数据实时监测,部分中小企业存在“碳排放年底集中算账”违规操作,现有管控多侧重末端污染物查处,碳排放履约、煤炭消耗管控惩戒力度偏弱。

二、以审计监督效能提升助推重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路径

(一)聚焦能源转型与生态碳汇短板,强化中长期结构性政策审计赋能。针对能源转型、生态碳汇未达标的堵点,需强化对长期性、结构性绿色政策的全过程跟踪审计;建立重大政策跟踪审计专项,重点核查能源转型激励政策、碳汇价

值转化政策的制度缺陷与落地效果,重点审计新能源项目落地、林业碳汇培育、生态修复资金绩效等内容,研判能源保供与低碳转型的矛盾点,罗列新能源开发等扶持政策可优化之处;同时,强化林业生态资金绩效审计,重点检查山地造林、森林提质增效项目资金使用情况与效益,揭示碳汇项目建设、价值转化中问题,助推完善林业碳汇交易、生态补偿配套机制,推动减污降碳由末端治理向源头结构优化推进。

(二)健全跨区域协同审计监督体系,破解流域大气联动治理壁垒。构建跨区域联合审计机制,依托川渝联合监督机制,开展跨界流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专项联合审计,统一建立核查内容、问题认定标准、整改落实等审计规范。在流域联合治理中,审计重点检查跨界区域治理规划、交界区域排污监管责任划分等情况,揭示跨区域规划、执法标准、治理情况等突出问题,对此针对性提出整改意见并跟踪整改闭环。在大气联防联控领域,审计应重点关注川渝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衔接情况、协同减排目标完成度等内容,揭示大气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等突出问题。通过跨区域协同审计监督,能够解决跨界隐蔽排污、协同治理浅显等问题,提升川渝区域减污降碳一体化治理效能。

(三)强化企业全周期审计监督,补齐主体转

型与数据管控短板。建立企业全周期审计监督体系,审计聚焦化工、建材、煤炭加工等高耗能企业,专项核查低碳技改补贴、绿色金融扶持等

激励政策落地与成效,针对政策兑付流程繁琐、碳市场交易活跃度低、激励效果不足等问题,提出政策优化意见。在管控方面,建立企业煤耗能耗、生产台账、碳排放数据全周期审计核查机制,及时发现未批先建、台账数据不全、数据不实等不规范行为,纠正中小控排企业集中核算、推算估算的现象,并在过程中提出解决措施。通过强制审计明确企业生态主体责任,引导企业从末端被动治污转向源头主动降碳,持续提升企业参与减污降碳的积极性,全面激活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内生动力。

三、结语

精准聚焦重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突出堵点,以全方位审计监督赋能政策迭代优化,通过结构性审计、跨区域联合审计、企业动态审计组成的多维路径,能够助力重庆统筹生态保护与工业转型,持续提升全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课题名称: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研究”(课题编号:2023PY38);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重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村支两委审计监督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22SKGH515)

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传播已逾百年。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命题下,一个常被忽略的环节是:西方读者接触到的,从来不是唐译宋词的“全集”,而是经过拣选的“选集”。从19世纪翟理斯的《古今诗选》,到20世纪庞德的《华夏集》,再到当代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选集》,每一部英译选集的编纂,本质上都是文化的筛选与阐释。“选”什么、如何“释”,决定了中华文化以何种面貌走向世界。

一、“选”的背后:经典的偏移与重构

选集编纂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是篇目的取舍。这一看似出于编者个人趣味的选择,深层来看实则是文学经典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重构。

以影响深远的《华夏集》为例,庞德选译了19首中国古诗,以李白诗作为主体。庞德笔下的李白,是一个充满意象主义色彩的现代诗人,《长干行》被译为《河商之妻》,成为英语诗歌名篇。然而,庞德的选目几乎绕开了“诗圣”杜甫,杜甫在《华夏集》中仅收录一首。这一取舍并非偶然:李白奇崛的想象与意象跳跃,更契合庞德所倡导的现代主义诗学;杜甫深沉的史笔与严谨的格律,则难以在当时的主流诗学框架中获得共鸣。

此后数十年,西方读者通过英译所认知的“中国诗歌”,很大程度上由这种选择性呈现所塑造。寒山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是跨文化选篇中另一个典型案例。寒山在中国传统诗学中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但经加里·斯奈德等译

者选译后,其诗作中的禅意与山林意象恰好切中了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的精神需求,寒山也因此成为英语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中国诗人之一。这种“墙外开花”的现象,鲜明地体现了跨文化语境中“拣选”的力量。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深层逻辑: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选集,从来不是原典的“等比例微缩”,而是经历了跨文化语境下的二次拣选。这种拣选受制于译入语的文学传统和接受期待,它推动了中国诗歌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经典化,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典谱系的偏移。讨论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要正视这种偏移的存在。

二、“释”的维度:从文字翻译到意义生成

如果说“选”决定了文化输出的内容边界,“释”则决定了这些内容如何被理解。“释”不仅指向翻译策略,更包括序言、注释、点评、诗人小传等副文本所搭建的阐释框架。

考察百余年来重要的英译选集,可辨识出三种阐释范式。第一种是“归化式阐释”,以翟理斯为代表。其译本采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语言,将中国古诗纳入英语传统格律,为每首诗添加背景和轶事,目标是让中国诗歌变得“可读”,代价是削弱了其异质性美感。第二种是“异化式阐释”,以刘若愚、叶维廉等华裔学者为代表。他们强调中国古诗在语法、意象和美学上的独特性,通过逐

字对译、保留句法断裂等方式,力图复现中国诗歌的本原质感。第三种是近年来兴起的“深度阐释”范式,最具代表性的是宇文所安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其注释体量往往数倍于译文本身,他将同一首诗的不同英译本并置,辅以细致的文本分析,展示意义如何在翻译中生成、偏移或增殖,使古典诗歌的英译成为动态的意义场域。

三种范式的演进,折射出中华文化走出去从“单向输出”到“对话互鉴”的深层转型。归化策略意在“求同”,试图证明中国诗歌符合普世性文学标准;异化策略意在“存异”,强调中国诗学的独特价值;深度阐释则走向更高层次的融合,在“同”与“异”之间开辟出对话的空间。

三、从“走出去”到“走进来”:编纂理念的当代启示

理解“选”与“释”的文化机制,为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实践提供了重要镜鉴。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倾向于追求规模和声势,投入大量资源编纂外向型译本,却较少追问这些译本是否真正进入了西方读者的阅读视野。

有两个层面的反思尤为紧迫。其一,编纂主体的多元性问题。目前,国内推出的古典诗歌英译工程,大多由国内学者主导,编选标准延续中国古典文学的内部评价体系,对目标读者的接受心理缺乏充分考量。理想的编纂格局,应是中

外学者、诗人、翻译家的深度协作,形成真正的对话。其二,“释”的供给侧改革。中华文化

走出去,最难的不是翻译文字,而是让译文背后的世界观、审美观和价值观在异质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宇文所安式的深度阐释不是用结论去说服读者,而是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引导读者自己形成认知。这种“授人以渔”的方式,比提供一套现成的标准译文更能赢得异文化读者的认同。更深层地看,中国古典诗歌最珍贵的遗产,不仅在于具体的诗句和意象,更在于一种独特的诗性思维——在有限文字中蕴含无限意蕴的能力,让物象与心象交融的美学境界。这种诗性思维具有超越语言和文化边界的潜能,可以成为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深层贡献。

编纂一部优秀的古典诗歌英译选集,不只是一项翻译工程,更是一场文明对话的实践。它以“选”确立对话的议题,以“释”建构对话的方式,当一首唐诗能在异国课堂上引发同等深度的共鸣时,中华文化才算真正“走了进去”。这,正是古典诗歌英译选集编纂应当追求的境界所在。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6年度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编号:2026YB028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J26LW26)。